

红岩魂系列丛书

红岩魂解说词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编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岩魂解说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编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红岩魂系列丛书)

ISBN 7-5014-1631-1

I. 红… II. 重… III. 革命传统教育-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IV. D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404 号

技术设计:祝燕君

红岩魂系列丛书

红岩魂解说词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编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64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 7-5014-1573-0/D·749 定价:3.00元

印数:30001—40000

前 言

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旧的死亡，新的生长；在这个世纪，屠杀、掠夺、战争、贫困、一切人类的苦难都创造了历史上空前残酷、惨痛的最高纪录；在这个世纪，人类为了拯救自己，反抗强权，反抗暴力，处处都表现了最英勇、最果毅的精神！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

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为了免除下一代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铁窗黑牢里，革命先烈们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身经残酷的折磨，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大义凛然，表现了他们坚贞不屈、临危不惧、斗争到底的革命情操。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革命者凭着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执著追求，用自己的血与肉，无情地嘲笑了敌人的疯狂和愚蠢。他们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磅礴天地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塑造了一个个巨大而崇高的形象。歌乐山的一草一木、杯土块石，记录着先烈们“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

雄业绩。

革命加拼命精神，严于律己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绝不屈服的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是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事实，是再造我们民族魂的重要源泉，是支撑我们社会的精神支柱。

目 录

- 第一部分 禁锢的世界 (1)
- 第二部分 从来壮烈不贪生 许党为民万事轻
..... (9)
- 第三部分 愿以我血献后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 (29)
- 第四部分 失败青黄土 成功济苍生 (50)
- 第五部分 血与泪的嘱托 (59)
- 第六部分 烈火中永生 (79)
- 第七部分 红岩精神在重庆 (89)
- 第八部分 烈士血凝万代心 (94)

第一部分

禁锢的世界

人间地狱

1938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随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在重庆大肆发展特务组织。1939年春，军统为躲避日机轰炸，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强占歌乐山下五灵观磁器口一带民房，建立乡下办事处。不久，用重金购买白公馆，霸占渣滓洞煤窑，改造为看守所。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在此大肆训练特务，搜集机密情报。这一带约四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为神秘的特区。荒僻险峻的山谷，被岗哨、电网严密封锁。昔日风景秀丽的歌乐山，成为关押、迫害革命者的人间魔窟，充满腥风，洒满毒剂。黑牢诗人蔡梦慰烈士对这地狱般的世界作了真实的描绘：“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为两边……阳光呵，空气呵，成了有限的给予……”。

在被严密封锁的禁区里，一旦误入，即会招至坐牢之虞，杀身之祸。1941年3月，国立六中四名中学生冯鸿珊、李仲达、陈河镇、石作圣从璧山来渝，因误入特区而被捕。四名

无辜的中学生就这样从十八、九岁关押到二十七、八岁。从重庆转到贵州息烽监狱，又从贵州息烽监狱转到重庆白公馆，一个个被折磨得头发花白，看上去像小老头，最后惨遭杀害。

在特区内，军统划地为牢。除白公馆、渣滓洞两座监狱外，还设有十多处秘密囚室，这些秘密囚室，一般只关押一人，由重兵把守。杨家山秘密囚室，关押过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杨虎城将军。该囚室位于半山腰，有平房四间，由将军一家与龚国彦特务队分住，外层由一连宪兵设岗。在这里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女士被特务迫害致死。蒋家院子秘密囚室，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曾两度被囚于此，著名的《囚歌》即诞生于此。黄家院子秘密囚室曾关押过廖承志同志。松林坡戴公祠，原是戴笠为讨好蒋介石而修的别墅，曾因禁禁过张学良将军，解放前夕，张将军从这里被押至白市驿机场飞往台湾，离开大陆半个多世纪。

两口活棺材

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有大小监狱十多所，最大的两所监狱白公馆、渣滓洞被称为“两口活棺材”。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坐落于歌乐山腰，地势险要。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审讯、保密起见，将其选中辟为军统局本部看守所，将小龙坎枣子堡看守所秘密迁入，原大门终日关闭，只开一小门供人进出。狱中有牢房十余间，还有终年不见阳光的地牢和专门拷打审讯革命者的刑讯洞。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所关押人员全部迁往渣滓洞。抗战胜利后，白公

馆又作为特别看守所重新关人。至重庆解放前夕，关押的除息烽监狱撤销后转移来的“政治犯”外，还有重庆行辕二处渣滓洞看守所寄押的刘国铨、周均时、周从化等近30人。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大屠杀，仅20人脱险。

白公馆看守所地牢，原是储藏室。终年不见阳光。《红岩》小说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韦德福烈士曾被关押于此。韦德福，四川万县人。曾参加国民党宪兵，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脱离部队，经进步朋友介绍到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学习。1947年参加抗暴运动，受伤被捕。在狱中态度坚决，顶撞看守，被关进地牢，他用自己的双手将地牢挖开一个洞，趁夜越狱，不幸摔断了腿，被特务抓回。1948年7月被杀害于白公馆附近的荒郊。

渣滓洞原为一座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1940年军统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工人住房，将其改为看守所，渣滓洞分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楼一底男牢16间，女牢两间以及放风坝。为了从精神上瓦解革命者的斗志，特务在内院墙上写有“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清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等标语。外院为特务的办公室、刑讯室。为了防止革命者越狱，在监狱沿途挂有汽车轮盘作的警钟，每隔一段时间敲响，寂静的山谷钟声此起彼伏，充满着阴森、恐怖的气氛。1947年4月，渣滓洞曾一度关闭，1947年12月又重新恢复关人。关押的主要是在“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等被捕的革命者，关人最多时达300多人。江竹筠、许建业、刘

国钰等曾被关押于此。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溃逃前夕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仅15人脱险。

在军统局，白公馆、渣滓洞两座监狱被称为“中学”，重庆望龙门看守所被称为“小学”，息烽监狱被称为“大学”。

美蒋特务大本营

中美合作所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局为了提高反动统治地位，建立法西斯特务警察队伍，急需获得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而美国为了获取中国的政治、军事、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资料，从而加强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控制，为此，双方协议成立了这一个国际性特务机关。

中美合作所成立于1943年春，结束于1945年底，总部设在杨家山，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任副主任，梅乐斯曾毫不掩饰地说：“我憎恨所有的共产党人，应当在中国消灭他们，本人乐于从中出把力。”于是在“共同抗日”的幌子下，1943年、1944年、1945年中美双方就合作内容、范围签定了三次协议，根据协议，中美合作所成为一个与军统局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特务组织机构，控制、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下设若干单位。主要有：军事作战组、心理作战组、情报组、气象组、行动组、交通运输组、医务组、会计组、总务组、总办公室、东南办事处。

中美合作所在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国特工部门为军统提供各类武器、装备、特工器材9000余吨，建立了156个气象站和通讯电台，并先后在全国各地举办了20多期训练

班，为军统装备了近5万名特工人员，培训特工的主要项目有：驾驶、摩托、擒拿、搜查、谋杀、爆破、射击、无线电控制技术等。

蒋介石对中美合作所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曾在1944年、1945年，多次到中美合作所视察，检阅特警班学员。

中美合作所国际电台设于1943年，其设备优良，除有10余部中程发报机外，还有3千瓦远程发报机两部，可与华盛顿和东南亚海军基地通报，总台之下设有80余个分台。

中美合作所是帝国主义同国民党反动派共同孕育的一个怪胎，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迈克·沙勒博士在所著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指出：“在战时中国政治和经济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带政治色彩的中美合作所人员在影响中国两个敌对派系的当前政策和未来前途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美合作所直接卷入中国，心甘情愿地帮助实行秘密的军事纲领，并致力于摧毁革命运动，这一切使它对中美关系发挥了极不相称的影响……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

国民党特务在西南地区所犯暴行

军统局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其前身是“力行社”特务处，成立于1932年4月1日，1938年改组为军统局后，军统仍将“四·一”这天奉为创业史上的纪元，年年开会纪念。贺耀祖、钱大钧、林蔚曾任过军统局局长，但操纵军统实权的则是戴笠。

戴笠，字雨农，1891年生于浙江江山县。1926年考入黄

埔军校第6期骑兵科。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1937年在上海筹组忠义救国军，1938年8月升任军统局副局长。1940年又兼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财政部缉私署署长。1942年7月，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以搜集情报、铲除异己、嗜杀成性而深得蒋介石的垂青和宠爱。戴笠长期领导国民党特务及情报工作，曾组织策划了许多暗杀、绑架活动，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鲜血。1946年3月，戴笠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

抗战时期，军统局机构、人员急剧膨胀，大小单位有50多个，全局总人数达15万人。在西南地区内设立了“川康区”、重庆特区、贵州站、云南站，在重庆设置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在贵州设置了特大号集中营——息烽监狱。

周养浩，浙江江山人。30年代初，即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专职法官。抗战初期，作重庆市警察局第三科科长。1941年，接替侯子桢担任息烽监狱主任，后任军统局西南特务区副区长。1945年他下令杀害了军统电台特支书记张露萍及张蔚林等七人。1949年9月，将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六口人骗至重庆松林坡杀害。他又是云南昆明“九·九”事件的元凶，下令逮捕了300多位革命者。1949年12月在昆明被俘，1950年转押重庆白公馆。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监狱，1975年被特赦后定居美国。

徐远举，《红岩》小说中阴险毒辣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1932年加入军统，1946年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指挥破坏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致使100多人被捕。1948年升任西南四省最高特

务机关——西南特区区长，亲自策划指挥了杀害杨虎城将军以及白公馆、渣滓洞的大屠杀，对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1949年12月在昆明被俘，1950年从昆明解回重庆，关押于他一年前囚禁和屠杀共产党人的白公馆看守所。1956年转至北京功德林监狱。在党的感召下，积极改造。1973年，病死于医院。

军统特务肆意横行，为祸全国，它在西南特别是重庆盘踞十年之久，给这些地区造成的灾难尤为惨烈，其累累暴行，罄竹难书。

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举行集会，被特务打死打伤多人，制造了“一二·一”血案。

1946年7月，特务在昆明暗杀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7年2月，国民党特务包围封锁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强迫全体人员撤返延安。

1947年6月，国民党特务制造全国性大逮捕，重庆居全国之首，达200多人。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遭到特务破坏，被捕者达133人。

1949年9月，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朝天门纵火，制造了“九·二”火灾惨案，上万人被烧死、淹死，数万人无家可归。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制造了“11·27”大屠杀惨案，殉难者达200多人。

残暴的刑罚

集中营是反动派进行血腥镇压，残害革命人民的罪恶渊

菽，集中营的刑罚约有 40 余种，汇集了古今中外之大成。

吊刑，用麻绳将被审者手或双手双脚捆吊悬空，用鞭子猛力抽打。

灌刑，用装满煤油或辣椒水的大铁壶朝受刑者鼻孔浇灌，受刑者即呛咳不止，口鼻喷血。

火刑，用烧红的烙铁在受刑者身上烙烧，称为烧烙铁；在一个铁桶里装上炭火让受刑者赤身背上，称背火背篋；将受刑者反绑吊起，用香火或辣椒熏，谓之烧辣香。

夹竹筷，用又粗又长的毛竹筷子连在一起夹受刑者的手指，使利如刀刃的竹筷嵌入骨髓，痛不欲生。

老虎凳，这本是封建王朝对付江洋大盗的酷刑，军统特务却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将受刑者绑在条凳上，背靠木柱或墙，使人的身体成 90 度，再将膝关节用杠子压住，往受刑者脚跟下垫砖，一块两块，还可咬牙忍受，加到第三、四块时，受刑者便昏死或折伤双腿。

面对残酷的刑罚，革命者坦坦荡荡抒发了自己的情怀：“革命何须问生死，将身许国倍光荣”、“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第二部分

从来壮烈不贪生 许党为民万事轻

在白色恐怖的旧中国，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以改造旧中国，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中。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祖国的繁荣、富强，他们“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把自己的青春、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壮丽的解放事业。他们身上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勇于奉献的精神之光，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将永远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高扬党的旗帜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里，无论是在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前线，还是在白色恐怖、充满血腥风的敌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们心中树立起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大旗从未动摇，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始终高扬党的旗帜，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党的尊严，用自己的行为实践证明了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

1940年国民党为了破坏我党和四川地方实力派的联合，由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率领200多个暴徒闯进了四川实力派潘文华的银行仓库抢米，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以此为借口，公开逮捕了罗世文、车耀先等10多名共产党人。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县人。1924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与杨闇公、肖楚女等领导了重庆人民反对日本商船“德阳丸”的暴行和声援“五卅惨案”的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派去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历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等职。长征后，罗世文担任延安红军大学理论教授。抗战后，被党中央派回成都，领导四川的统战工作，公开身份为刘湘高等顾问，《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负责人。

车耀先（1894—1946）四川大邑县人。早年投身川军，曾任团长，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愤然退役。他曾信仰过基督教，在失望和彷徨中东渡日本，最终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29年，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成都主办“注音符号传习班”，启发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之路。抗战期间，车耀先以经营“努力餐馆”为掩护，担任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并创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先后囚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和贵州息烽监狱。在息烽监狱，罗世文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以此拒绝参加狱中的任何所谓工作。车耀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利用管理图书之便，在狱中传递消息。他们成立了狱中临时支部，罗世文任书记，车耀

先、韩子栋任支委，领导狱中斗争。由于罗世文、车耀先的社会地位较高，特务多次对他们进行拉拢、利诱。1945年中秋节，特务设宴邀请了罗世文和车耀先，企图触发他们思乡、思亲之情，动摇意志。罗世文指着丰盛的酒宴说：“这些都是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我们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灌满我们的肠胃。”说完，两人大踏步的走出客厅，使敌人狼狽不堪。他们早料到敌人会对自己下毒手，他们坦然准备着为自己的信仰献身，车耀先在牺牲前写下了长达万言的自传，告诫教育子女“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勉励他们务必永葆革命家风。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中共代表团虽不断抗议，进行营救，终为国民党所拒绝。重庆谈判时，党中央明确提出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蒋介石一面谎称罗、车二人早被枪决，一面又命令特务将他们二人改名换姓。1946年7月，罗世文、车耀先等72人由贵州转往重庆渣滓洞看守所。1946年8月18日，军统特务谎称要将他们二人送往南京释放，罗世文意识到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他从容不迫，在一本俄文书的扉页上给党组织写下了最后一封信：“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封信由一位难友藏在皮鞋夹底带出，这短短的遗文，字字珠玑，熠熠闪光，他是一位老革命家对后人的殷切希望。在押往刑场的路上罗世文口头吟诵了就义诗：“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面对死亡，仍然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大无畏精神。车耀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实践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庄严誓言。特务在松林坡戴公祠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后，为了毁灭罪证，将二人的遗体纵火焚烧，然后将他们的骨灰装在瓦罐子里面。解放后，根据特务交待找到了他们的遗骨，在被害处重新建墓安葬。周恩来同志亲自题写了墓碑。

许晓轩（1916—1949） 江苏江都人。15岁时由于生活所迫，停止了学业，当上了学徒工，后又在面粉厂当会计，不到一年就升任财会的主要负责人。1938年初，许晓轩随厂迁到了重庆，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同年5月，经杨修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许晓轩担任了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在担任区委委员后，他经常深入基层特别是工厂，去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1940年4月不幸被捕，囚禁在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在狱中他得知家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便用铅笔在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下“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去，表现了他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1941年10月，许晓轩被转囚于贵州息烽监狱，他被分配在木刻部雕刻模型。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为了表示其对主子的忠心，要许晓轩在监狱的两棵核桃树上刻“先忧后乐”和“忠党爱国”两条标语。许晓轩刻好“先忧后乐”后，故意从树上摔下来受伤。从此，后一条标语再未刻上。先忧后乐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1946年7月，许晓轩由息烽转囚于白公馆，在狱中他和韩子栋、李子伯、潭沈明一起积极进行狱中策反和越狱准备。因时机不成熟未能实现。后来，李子伯转押渣滓洞，许晓轩曾作七律《赠别》相送：“相逢狱里倍思亲，共话雄图叹未成。临别无